

A, DUN HUANG

啊， 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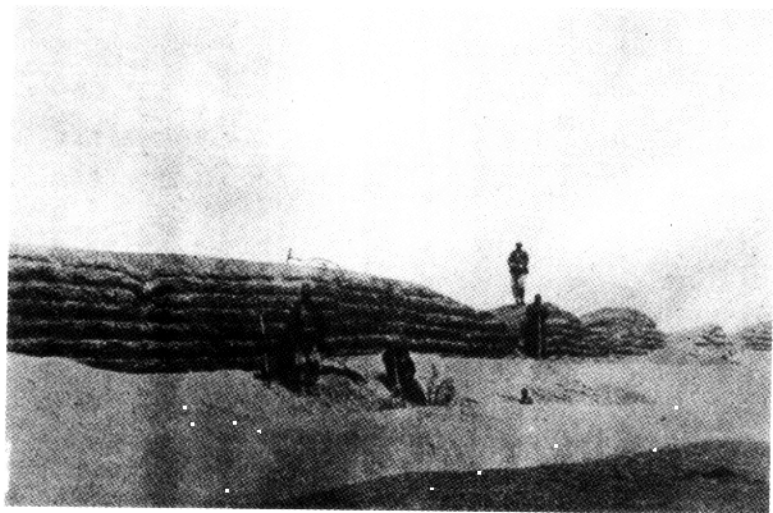
王
渊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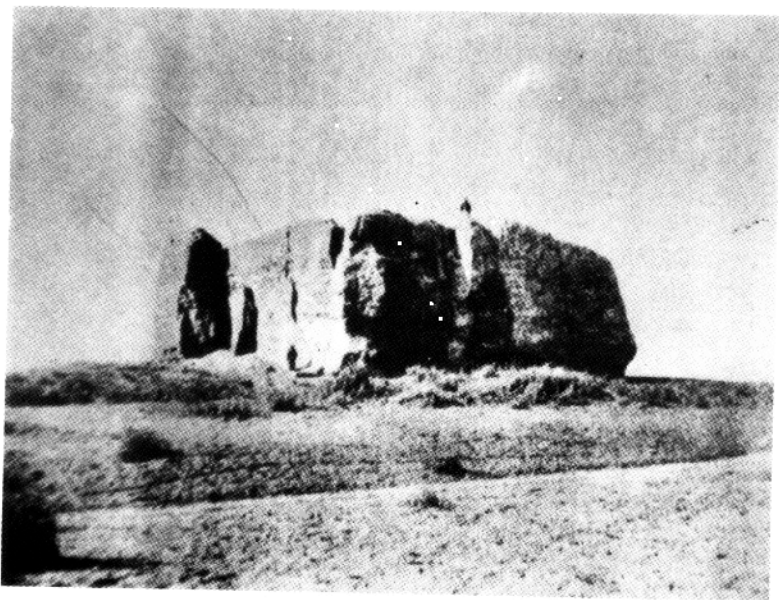


A,DUN 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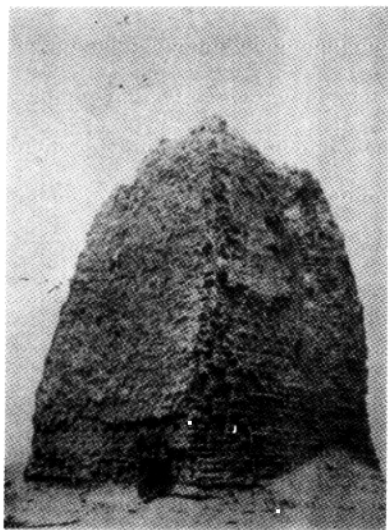




摄于 1907 年的敦煌汉代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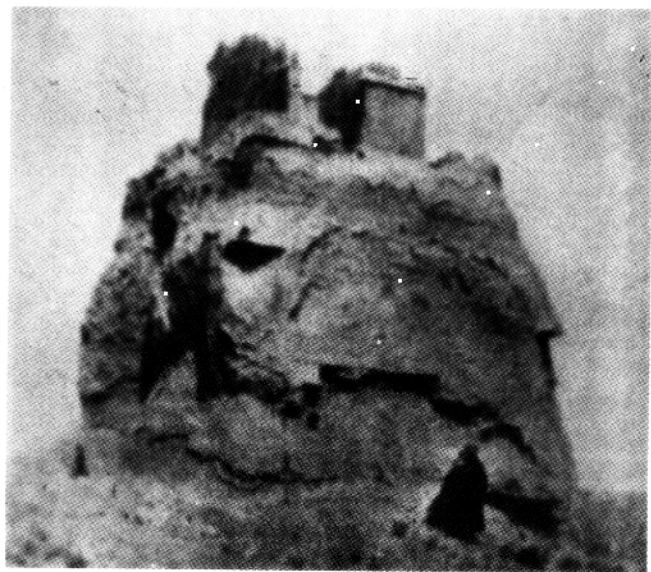
摄于 1907 年的敦煌汉代玉门关



摄于 1907 年的敦煌汉代长城烽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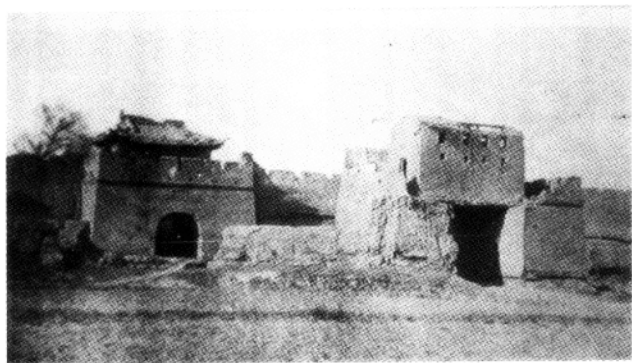


摄于 1907 年的汉代敦煌阳关烽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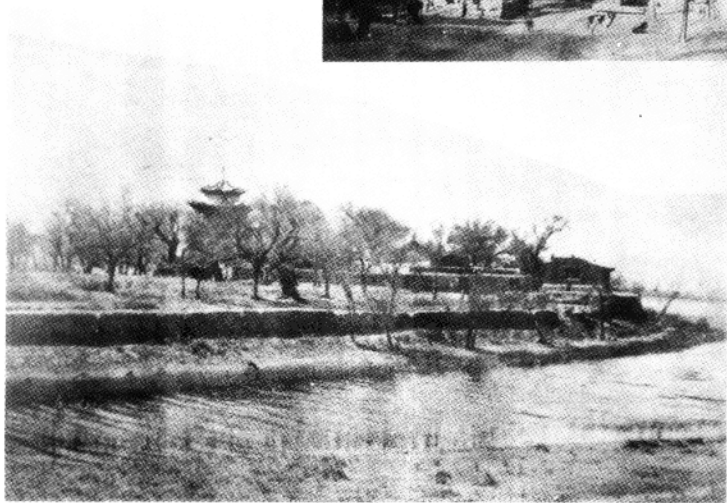


摄于 1907 年的敦煌汉代长城烽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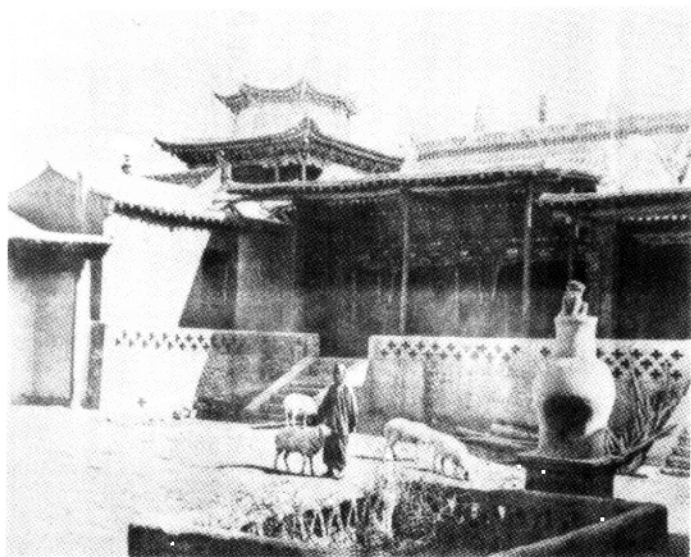
城南门（靖远门）
1943 年的清代敦煌



煌城东门（迎恩门）
1943 年的清代敦



1943 年的月牙泉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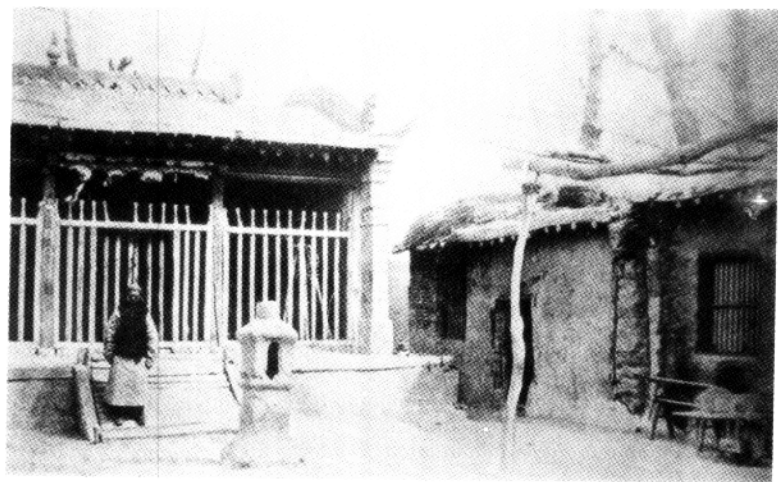


1943 年的月牙泉寺院



40 年代四月初八
莫高窟庙会

敦煌民众欢度 1943 年的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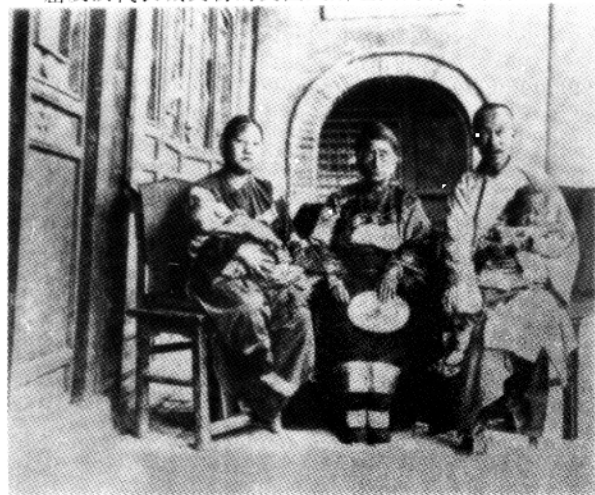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敦煌农村的庙。图中庙门台阶上站者是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英国人斯坦因的中国人帮凶蒋孝琬。庙旁矮屋为一乡村小学校



1953 年四月初八莫高窟庙会上农民坐的牛驴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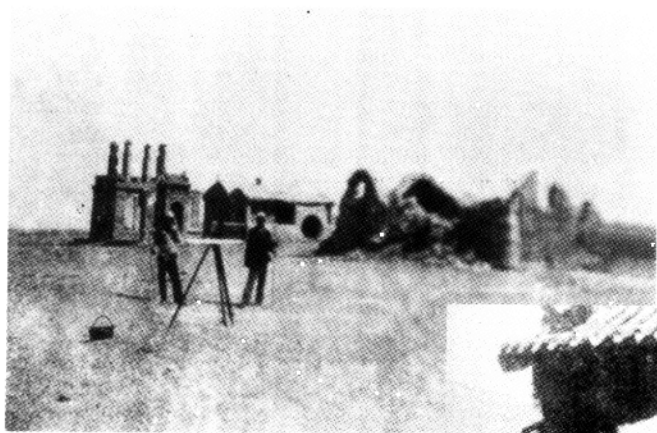
1907年3月至5月,1913年至1915年先后三次盗窃敦煌莫高窟及汉代长城文物的英国人斯坦因的行李车停在敦煌县城



1907年的敦煌知县王家彦全家人合影



1941 年向达任考古组长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由兰州赴敦煌途中



1943 年由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考古组在敦煌县杨家桥乡鸣山村的佛爷庙进行考古测量



夏鼐、向达在莫高窟



员邵元冲及秘书高良佐拍摄的敦煌党河
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1936年6月邵元冲在阳关



1936年6月邵元冲在
月牙泉

难写的序

今年3月底，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妻韩雅芳电话告诉我，王渊托人捎来他写的书的打印稿，有厚厚的三大本。我知道，这是他在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呕心沥血之作。书名《啊，敦煌》，使人为之一振，这不正是敦煌之子拳拳的心和沸腾的血吗！

那年，老友陈学禹（原敦煌市政协副主席、农业专家）猝然病逝，王渊有信给我，言辞中闪烁着悲戚。之后，他抓紧整理了自己的几十首旧体诗，油印成册，赠给老师、同学和朋友，我也得到一册。记得在诗集的后记中也有悲戚的话，是怕像学禹一样匆匆离去，留个念想。次年春天，王渊和王伟元同志（上海人，为敦煌水利事业苦干了几十年）为党河水库副坝围堤灌浆问题来省城公干。我得知后匆匆赶到兰州饭店看望，希望他保重身体，在工作之余能为敦煌人民写点东西留下来，他欣然答应了。回去不久，便有了十几章的提纲和部分书稿。谁能想到他忙里偷闲，一年有余，就洋洋几十万言！

成书之前，王渊曾邀我为之写序，我也欣然答应了。妻把书稿捎到北京，我读之再三，如见其人，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朴实无华的文字里燃烧着对敦煌的历史、今天深深的爱，升腾着对敦煌美好未来的憧憬。浩繁的内容，翔

实的史料，执着的情感，都使人犹如捧读一颗滚烫的心，耳边轰鸣着十几万敦煌儿女的心声！读王渊的书，爱不释手，为之写序却难于下笔。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把书稿又背回兰州，奉调后又带到呼和浩特。8月王渊有信催序，说书很快就要付梓了，并说9月17日兰州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校庆”了，并希望在母校能见到我。学兄长我十岁，无序奉上，何颜相见。但要写起来，仍是很难，因为盛大辉煌的敦煌我能写得了吗？写写作者又如何呢？也难，因为他是敦煌的儿子。以我之德才，何以为序？既已允诺，又不能失信。真成了一块拂之不去的心病！

写历史，是当代人为了抚慰自己的心灵，寻找现实的某种历史根据，或者用以结构某种思想。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器皿、符号不再成为一种简单的因果链条，而张扬着充溢着鲜活而动人的精神力量时，这历史便有了灵性。这样的历史才会把人带进岁月的深处，让人获得某种认知、体验、触动、升华之后，更深地更个性化地去把握历史挥洒出的那一份思想。就敦煌而言，能够阐释和注解敦煌逝去的岁月的不仅仅是莫高窟和两关。我更愿意走进敦煌岁月的深处，去感受历史每一天的晦明风雨。而王渊所作《啊，敦煌》直接给了我一条认识、理解、感悟敦煌的途径。书中《汉武帝、李广利和天马》、《班超、班勇与玉门关》、《李广的后人在敦煌立国》、《彭总从敦煌走向庐山》等篇，作者抓住有关敦煌历史渊源的几个事件和人物，让泣风惊雨的时代画卷构成敦煌历史的一种辉煌；《春风来

叩玉关门》、《耸立在敦煌田野上的铜像》、《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旗帜》、《敦煌会记住他们的忠诚》等篇，则让我们对近代和现代敦煌的每一天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了那一个个独具性情而又景况各异的人们是怎样为敦煌的人民和历史奋斗着，奉献着，这是让历史为之自豪的一笔。《王爱，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敦煌窦氏的风雨春秋》、《敦煌的思想者》、《乍寒还暖时节的敦煌英才》等篇无疑是一幅幅具体形象化的政治历史画卷，让人典型而又真切地了解了当代敦煌人的生活、命运与时代风云变幻是多么的息息相关。这些篇章使我们看见作者对历史前进的力量充满了自信，让人对社会历史曲曲折折的进程不再消沉、不再悲怆。《近代敦煌人从甘肃五十六州县走来》、《敦煌人的脚印》两篇让人对敦煌先民的艰辛和悲壮肃然起敬，让人对一个个饱蘸着血泪写下的故事各异的村名、地名不敢有任何的轻薄。《凝刻在敦煌记忆中的左宗棠与白彦虎》及《马仲英祸害敦煌》则让人对充满了灾难与动荡不安的岁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拒绝和厌恶。《五月的鲜花》是作者用歌声串起了一个时代，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书生意气的作者，在五月如花的歌声中，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与把握，让人读出来的是荡气回肠的诗情，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是滋润和涵养了民族精神的另一种文化力量。《少年时代的敦煌印象》、《敦煌旧事》两篇，则是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际，塞上古城敦煌的剪影、素描。读此文，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对光明、解放、进步的渴望。总之，洋洋洒洒、独立成篇、长短不

一、内容广泛、跨度漫长的 25 篇文字，几乎是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漫长的岁月中敦煌的风风雨雨，让人对敦煌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水利、文化、沿革等方面的演变、进步有了翔实而又全面的审视与了解。从这一点上讲，《啊，敦煌》是一幅全景式的巨幅画卷，它让敦煌历史的每一个亮点，都具体而生动地从你的眼前掠过。这对一些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当代人，无疑是一种营养，是一种默化。它会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静下心来，从一种历史的精神和脉搏中，寻找到现实所需要的勇气与力量，寻找到做人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而这，我认为是这部书的意蕴所在。读这部书，它让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一种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是一种对历史精神的高度自觉，是一种对祖国和故乡真挚的热爱，是一种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严谨，是一种敢于质问的血性。贯注在全书的是巨大的热情和诗人般的气质与敏感。惟其如此，才让人在掩卷之余，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激荡而不能自己。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向人们呼喊感受着敦煌历史的良知。

我和王渊第一次见面是在 1986 年，那是盛夏的一个下午，我随酒泉地委行署领导检查工作来到敦煌七里镇（副县级建制的大镇）政府，王渊时任代理镇长。他汇报工作敢于据实直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十月我调任敦煌县委书记，没想到四十六岁的王渊做了政协副主席，并且办公室和我对门，他不怎么搭理我。开始一段，有人找我找到他办公室，日子多了，他嫌麻烦，说“我成了你

书记的听差了”，很快就搬走了。此后，在工作中他毫不留情地提意见，给我写过一些“备忘录”（意见书），愈使我感到真切和可贵。于是我们之间有了一次次畅谈，一次次在农村调查，在斗室，在田间地头，在农户炕上，在党河水库工地，在肃北野马河源头，数九寒天在鸣沙山下测风口的酒泉地区林科所副研究员韩泽民那里，大年三十顶风冒雪去五圣宫的路上，……久而久之，我愈来愈感到这位政协副主席是离不开的“诤友”，愈来愈感到这位农业专家的分量。工作之余，我们谈古论今，有时回忆起儿时，忘情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春节晚会上，我们同台高歌《卡秋莎》。在敦煌之声诗会上，他昂首阔步登台，以诗言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之志。后来，他又到政府作主管农业的副市长，颇有建树，在敦煌各界和群众中口碑颇佳。80年代末，敦煌市在转渠口乡三个锅桩建设移民点，他坚持不懈抓了六年，新建的定西移民村近三千人走上富裕路，过春节锣鼓喧天地给王渊送“清正廉明”匾，一时间在陇原传为佳话。但他却不张不扬，面壁小屋，在当今实可珍贵。90年代初，他分工抓敦煌农村初级电气化工作，建成敦煌人民梦寐以求的南湖店、沙枣墩电站，提前一年得到验收，花钱最少，被国家计委、水利部授予农村初级电气化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从1994年到1997年，他带领全市农科人员奋力攻关，成功地防治了棉花蚜虫，植棉面积增加10万亩，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使敦煌农村在甘肃率先实现小康。当然，这只是些结果，其中付出的艰辛自不待言。

如今，王渊从敦煌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因为他生于1939年4月。敦煌人民十分珍爱他们培养的第一批重点大学毕业生。我常听人们说起王渊的成长，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是敦煌近郊杨家桥村人。1966年秋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曾是校合唱团的积极分子。毕业分配就回了家乡到农技推广站工作。期间，在五墩乡接受“再教育”时，曾腰系草绳干过生产队长的活儿。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不畏艰苦的倔强汉子才扬眉吐气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的行列，并担任了副站长、站长，科委主任。在农技推广战线上工作的十六年中，他充分应用自己的学识，发挥聪明才智，科研成果累累，推广新技术受到中央和省地县的多次表彰。敦煌农业科技的领先和增产增收中发挥的作用，在河西乃至更大范围影响都很大。在这方面王渊同志功不可没。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当年和王渊在一起常用以勉励自己的清人郑板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王渊做县官十几年，而且一直是副的，但他心系百姓，像老黄牛一样，为养育自己的敦煌默默奉献几十年，淡泊名利几十年，敦煌不会忘记。

写了这些，我们心自问，能称作序吗？姑妄为之，寄王渊同志斟酌吧！

杨 利 民

1999年9月2日于呼和浩特

目 录

难写的序·····	杨利民(1)
汉武帝、李广利和天马·····	(1)
班超、班勇与玉门关·····	(13)
李广与敦煌李光杏·····	(26)
李广的后人在敦煌立国·····	(35)
从明代沙州卫到清代沙州卫的 323 年·····	(44)
林则徐对敦煌的一瞥之后·····	(55)
凝刻在敦煌记忆中的左宗棠和白彦虎·····	(66)
近代以来敦煌人四次撰写自己的历史·····	(80)
近代敦煌人从甘肃五十六州县走来·····	(96)
敦煌人的脚印·····	(108)
写在敦煌红柳上的中国历史·····	(120)
马仲英祸害敦煌·····	(139)
春风来叩玉关门·····	(149)
耸立在敦煌田野上的铜像·····	(177)
敦煌不忘他们的忠诚·····	(212)
敦煌窦氏的风雨春秋·····	(230)
彭总从敦煌走向庐山·····	(258)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293)
五月的鲜花·····	(335)
王爱,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348)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366)
乍寒还暖时节的敦煌一代英才·····	(392)